

·章太炎与国学研究·

章太炎论清代学术

李 帆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在章太炎的学术史视野中, 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在回顾以经学为主体的清学史时, 其所采的研究视角大体是公允、平实的, 对各派学术、前辈大师的评价表现出近代学者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 时代因素又使得他的探究具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意味。章太炎论述清学史的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 即对清学总体特征、流派分布、传承系统等问题进行讨论的通论和对一些清学具体问题或某些学者予以评论的专论。从时间上说, 他是近代学者中最早系统阐释清学史者, 其见解基本是原创性的, 对后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键词: 章太炎; 清代学术; 通论; 专论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06)06-0001-07

清末民初, 一个新的学术潮流出现在学术舞台上, 这便是以回顾和总结中国学术发展历程为基本内容的学术史研究的兴起。^①此一潮流, 发轫于章太炎, 就像侯外庐先生所指出的, 章氏“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1](P826)值得注意的是, 在章氏的学术史视野中, 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对章氏而言, 清学是他生长的土壤, 其学术成就的取得, 无论如何也脱不开与清学的干系。不过遗憾的是, 现有的章太炎研究论著对其论清代学术之精义却大都注意不够。鉴于此, 本文拟对这一论题略加梳理, 以为引玉之资。

一 对清学史的研究视角

在清末民初一辈学者中, 关注清代学术的非仅章太炎一人, 毕竟他们皆是在清学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不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旅程, 所处的环境和所承袭的学术渊源不同, 所受到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亦不同, 加之时代因素的作用, 关注与研究清学的出发点自会存在差异。所以, 论及章太炎对清代学术的探究, 不能不首先注意其所采之研究视角, 这是凸显其研究特色与价值的关键所在。

(一) 基于自身学术渊源的研究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主体, 必要的经学训练为学人读书、治学的起点, 故学有所成者多具深厚经学基础, 以此触类旁通。章太炎的为学经历即是如此。

章太炎出身于经学世家, 外祖父朱有虔和大哥章璠是先后对他进行经学启蒙教育的严师。章太炎回忆道:“外王父海盐朱左卿先生讳有虔来课读经。时虽童稚, 而授音必审, 粗为讲解。课读四年, 稍知经训。”“时间说经门径于伯兄璠, 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 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 文必法古。”^[2]这样章氏自幼即在文字音韵方面受到严格训练并打下良好基础, 从而能一窥经学堂奥。为了全面了解清代经学成就, 1886年开始, 他通读了汇辑清人治经著作的《学海堂经解》和《南菁书院经解》, 使其治学有了较高起点。

1890年, 章太炎离家进入著名的诂经精舍, 学习如何准确地训释诸经疑难字句名物, 以阐明经文本义。此时精舍正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俞樾的学术成就以研治群经与诸子最为突出。他之治经, 虽一意追随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 “依王氏律令”, 但并不拘泥于此, 而是视野开阔, “为学无常师, 左右采获, 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3]所以他追踪王之《经义述闻》而作的《群经平议》以及其他说经著

收稿日期: 2006-07-08

作者简介: 李 帆(1961-), 男, 辽宁抚顺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事中国历史研究。

① 关于清末民初学术史勃兴之具体情形以及所以如此之缘由, 拙文《清末民初学术史勃兴潮流述论》(《吉林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有较详论述, 可参考。

引作,既遵循乾嘉学者重在研究声音文字的旧则,又吸取道光、咸丰学者寻求微言大义的长处,即本着古文学家治学规则的同时,不排斥今文家的某些说法。俞樾的诸子学成果主要体现在《诸子平议》上,重点在于通过字句疏解,使人们能够阅读这类古代典籍,进而印证儒家经义。这种做法,客观上推进了诸子研究。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整整七年,受到俞樾的深刻影响。他的研讨群经与考论诸子,在在皆有乃师风并光大之,如他早年重要的经学著作《春秋左传读》,便是一个例证。《春秋左传读》通过诠释《左传》中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和疏证《左传》体例、叙事所蕴含的本义,以及列举周、秦、两汉文献中袭用、引用或采用《左传》的情况,辨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亦非向壁虚造。很显然,该书表现出较多的古文经学倾向,与诂经精舍尚古文的学术立场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公羊学的观点也采纳了不少,如论证孔子作《春秋》是“立素王之法”,是为了“改制”,声称“《公羊》有改制之说,实即《左氏》说也。”^[4](P59—60、784)章太炎后来亦自认:“余初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5](P644)可见他与俞樾类似,在古文经学基础上兼容今文,并无狭隘的门户之见。至于诸子研究,他在俞樾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从《膏兰室札记》到《群经》中《尊荀》、《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独圣》诸篇,他力求通过诸子学的研究,打破儒家思想独尊地位,较之俞樾借研讨诸子来印证儒家经义,不啻是个飞跃;而且他从诸子学入手向下延伸,一步步系统探讨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开启学术史研究之风,更是俞樾无法启及的。

有学者认为,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可以“论学殊”、“革政同”来概括,所谓“论学殊”,体现在章、康经学主张不同,即章太炎恪守古文经学立场,而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6](P246—276)但从前述章氏在诂经精舍所受俞樾熏染和作《春秋左传读》的情形来看,很难把他断为古文经学者,至多只能说他主要接受了重文字训诂典章名物的古文经学训练,学术底色由古文经学构成,而又兼容今文,屏弃了传统的经学门户。不过,他后来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又自称:“余治经专尚古文”,^[5](P643)给人以古文经师的印象。一些学者亦认为他后来改变了早年的立场,皈依了古文经,重建了经学门户。这种看法仍是从传统的经今古文之分与家法来看待他的学说,实则与其本意不符。对章太炎而言,并非完全是以传统经师的眼光看待经

今古文,他心目中的“经”实为广泛概念,即“经之名广矣。仲尼作《孝经》,汉《七略》始传六艺,其始则师友讎对之辞,不在邦典。《墨子》有《经上下》,贾谊书有《容经》,韩非为《内储》、《外储》,次次凡目亦著经名。《老子》书至汉世,邻氏复次为《经传》;孙卿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经》亦不在六籍中。此则名实固有施易,世异变而人殊化,非徒方书称经云尔。”^[7](P52)所谓“经”,便是今人所言之“经典著作”,非高高在上的圣贤之书。进而言之,“经”即是历史文献。章太炎是清末持“六经皆史”说最力之人,他曾说过:“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8]这表达出他将经书视作历史纪录,不把经书神秘化的平实态度。既然经书是经典之作和历史文献,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讨,那么它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便至关重要了。从文献角度来说,比起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重文字训诂典章名物的古文经似更可信,所以章太炎在申明“余治经专尚古文”的同时,又强调“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5](P643、644)这显示出他心目中的“经”是相对可信、能作历史文献用的古文经。结合章氏不把经书神圣化,不以传统经师眼光看待经学的立场,这一将今文经排斥在外的表述,便不能视为是皈依古文经,重建经学门户的表现。实际上,他与康有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站在古文经的门户之见之上,而是要维护历史。”因“六经都是历史,但康有为那批今文经师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即以古史为伪,而今文家又重微言而轻事实”。^[9](P192、191)当然,章、康之间“有着‘主兼容’与‘主门户’的差异。但在章太炎主‘兼容’、反对今文家说的背后,更有着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存亡续绝’的深层关怀和长远计虑。”^[10]

由于有着相对超脱的立场看待今古文和视经书为历史纪录的较客观的学术态度,所以章太炎在回顾以经学为主体的清学史时,研究视角大体是公允、平实的,对各派学术、前辈大师的评价能表现出近代学者具有的科学精神(至于因政见因素而对今文家多所指责,是另一问题,容后另叙)。如他对吴、皖分际的见解,“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11](P158)颇得时人与后人的认同,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客观平实之论;他对本师俞樾的评价,在充分肯定俞樾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不客气地指其“不能忘名位”,“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3]这种不为师者、尊者讳的理性态度,在学术史的回顾与研

讨中,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任何学者所做的学术工作都不可能与其所承袭的学术传统和所受到的学术训练脱解开,章太炎作为一个学术基础由古文经学奠定的学者,他在评估清代学术时,自然较多地注重古文经学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亦需指出的是,章太炎虽摆脱了传统经学门户,但因学术上师承有自,门派有别,在面对具体学术问题,特别是面对与己相异的学术流派时,意气用事的主观判断便不能全然避免,褊狭之论必出,如果与现实问题、人事纠葛等相关,就更是如此。典型的例子如章太炎对龚自珍、魏源的斥责。^①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种有别于传统经师门户之见的派别偏见,反映的是近代学者不完善的主观意识,属人性之常,学理上指出和分析即可,不必求全责备。

(二)基于时代因素的研究

时代环境对学者的影响与制约无可避免,在这方面,人文、社会学者更甚。同理,章太炎在回顾清代学术时亦无法摆脱所处时代的制约,时代因素对他的研究视野起着规范与调整的作用。当然,作为具深厚学术渊源且博通古今的大学者,章氏有超越时代的识见与成就,但这种超越是有条件的,是植根于时代基础上的超越。

清末的中国,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两大因素至关重要,一为政治局势的走向,二为学术新潮的蜂起。

在有识之士眼里,此时的中国政治上的主题是救亡图存。救亡道路不一,基本差异在于是走保存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的维新之路,还是走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之路。两条道路的不同,意味着对现存政权的评价不同,故采取的变革方式有异。

众所周知章太炎是革命派在思想理论领域的重要代表。起初章太炎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是坚决支持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则日渐不满康、梁的维新保皇立场,逐步转向倡导革命。1900年8月初,章剪去作为对清王朝忠顺标记的长辫,并撰就《解辫发说》,以明与清王朝决绝之志,走上革命之路。此后,他陆续写出《客帝匡谬》、《分镇匡谬》、《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等革命檄文,揭露满清政府罪恶,主张进行以“反满”为旗帜的民族革命。

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随后创刊《国粹学报》,国粹派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章太炎此时虽在狱中,但仍成为该派的精神领袖。

该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12]故极重视对中国历代学术源流的探讨。而且作为革命派的一翼,该派成员在排满革命风潮兴盛之时“研究国学”,显然有彰扬民族气节,助益排满革命的用意,于是,民族主义或曰种族主义成为其论学的支点之一。

同理,排满革命与国粹主义的结合,使得章太炎研究清学史时,既有将其作为纯学术系统考察的一面,又有现实关怀成分,亦即以民族主义立场看待清学。章的同道刘师培曾指出:“学术之界可以混,种族之界不可忘也。”^[13](P1805)这句话便宣示了这种民族主义的论学原则。遵循此一原则,章太炎往往把清儒的“出处大节”即民族意识看得高于一切,如他对清初大儒汤斌、李光地贬斥甚多,称汤斌治学“终身无自得。特工为剽取,调和朱陆间以自文”,说李光地之学完全是窥人主所尚,“其习业因时转移”,“附会得人主意”,^[14](P346,347)所以如此,盖因汤、李皆替清廷效力,于是在章氏眼里学术上便一无是处。不仅如此,排满革命的政治立场还与当时的学派之争有牵连,某种程度上,这一牵连对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待学术起到了强化作用。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中的学者大体以受古文经学训练者为主,而维新派则基本为今文学健将。如此一来,政见纷争即不可避免地学术立场纠结在一起,回顾清学史时便有了一些情绪化的看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章太炎对晚清今文学者的估价。章氏在对出任清廷官吏的龚自珍、魏源评价很低的同时,对亦为今文家的戴望却评价较高,说他“中更丧乱,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然未尝仕。观其缀述《颜氏学记》,又喜集晚明故事,言中伦,行中虑。柳下、少连之侪也。”^[15](P118)此种评价,盖因戴望不仕清朝,耿介自守。这些言论,实际上针对的是保皇媚清的康有为。

平心而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评价学者,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局限于此看问题,不可避免会产生片面性。可贵的是,作为一代大学者,超越性的眼光是具备的,故章太炎对此点也是意识到了的,所以他在论清学时并未完全囿于民族主义的视角,主要还是以学术的标准看待学术。

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外,当时进步人士在政治上的另一诉求是摆脱专制统治,实现民主与自由。这种诉求在章太炎的政论中有体现,在他的清学史著述中也有曲折反映,即民主性原则亦是论学角度

① 见章太炎《检论》中《清儒》、《学隐》篇以及《说林》(下)的有关论述。

之一。不过在异族统治的大前提下,民主性原则往往与民族主义立场纠结在一起,其表述不及民族主义鲜明,而且在章太炎那里,民族主义总是第一位的,如章氏在谈及黄宗羲时,认为其“重人民、轻君主”的主张“固无可非议”,^[16]但因其著述中很少阐发被他视为头等重要的“历史民族”思想,所以未能得到他的高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与学术虽有多重关联,政治局势及其走向虽影响学术研究进程,但学术毕竟有其自身逻辑和独立性,并非全由政治左右。清末,学术新潮的蜂起众所瞩目,成为政局之外主导学术进程的关键因素,亦是影响章太炎清学史研究取向的重要因素。

所谓学术新潮,其核心是西学的涌入及所引致的中西交融之学的出现。在这方面,严复功莫大焉,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亦不遑让,尤其在学术实践层面,尽管个中情形不一。

章太炎是中国正宗学术的传人,但在吸纳西学方面不落人后。在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已经读过一些含有天体演化学说、生物进化学说的西人著作,并在《膏兰室札记》中运用这些学说来疏证《庄子》、《淮南子》中的一些论述,此后又陆续译述了《斯宾塞尔文集》、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等西学著作,对西方社会学有了较充分的了解与认识,尤其斯宾塞学说对其文化观的形成起着奠基作用。

章太炎的学术根基为中国古学,他之交融中西,其出发点即由此。他虽时以中学比附西学,但最终目的仍在阐释中学。这也是国粹派学者治西学的共同特点,就像《国粹学报》发刊辞所表明的,要“借西学证明中学”。^[17]有这样一种目的,他对西学的接受便不以介绍为主了(与严复相对照),而是力求运用西学疏证或诠释中国学术,以完善自身的学术体系。在论清学史时,这种视角同样存在。章太炎读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后,对其“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一点颇有心得,从而发现惠栋、戴震的文字训诂,也有类似功用,“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音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18](P172)这样,对惠、戴学术的评价较之就中

学论中学者便深了一层,使惠、戴学术的现代意义凸显出来。甚至可以说,正是西学这一新视角的引入,方使章氏的学术史探讨充满时代意义。

二 清学史研究实绩

前已言及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在1899年辑订的《国粹书》初刻本中,章氏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对先秦思想、学术史予以梳理。1900年夏秋间出现的初刻补佚本中,有《学隐》一篇议论清代学者。1902年删节修订《国粹书》时,章氏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其中论清学者有《颜学》、《清儒》、《别录乙》等篇。此后又有《说林》、《释戴》、《非黄》等一系列谈清代学术与学者的文章问世。进入民国后修订《国粹书》为《检论》。晚年又有《汉学论》和与学术史相关的一系列讲演,等等。可以说,对清学史的回顾与研究贯穿了章氏整个学术生涯。

章太炎的著述在体裁上比较单一,基本为夹叙夹议的短论,即便是学人传记,亦不例外,这与他总的著述风格是一致的。这些著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对清学的通论,如《清儒》、《汉学论》、《清代学术之系统》等篇,其中尤以《清儒》最为系统详实;二为对清学具体问题或某些学者的专论,如《学隐》、《颜学》、《别录乙》、《说林》、《释戴》、《非黄》、《俞先生传》、《孙诒让传》、《黄先生传》等篇。这里所谓通论、专论的分类,只是相对而言,出于研究上的方便,实则两者之内容常有重合之处,不可截然二分。

(一) 通论

章太炎对清学的通论主要涉及清学的总体特征、流派分布、传承系统等方面。在《清儒》一文中,他认为,特殊社会政治条件下出现的清学有如下特征:“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通雅。”^[19](P473、476)即由于理学衰落和清廷实行文化专制,造成经学考据独盛的局面,经学成为主体学问,但与汉儒相较,“短于风议”而“长于求是”,非经世之学。进而指出,清初顾炎武、阎若璩、张尔岐、胡渭诸硕儒皆对清学的形成有开创之功,“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19](P473)可

见在他眼里,乾隆时出现的吴、皖两派学术才是成“系统”的学术,此前为草创期。他对吴、皖两派之学术分野与传承系统的论述极为精辟,认为“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其弟子为江声、余萧客,所著书“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即吴派学者治学有唯古是从、缺乏创见之弊。皖派与之相异,该派始于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戴震弟子中最知名者为段玉裁、王念孙,“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乘,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19](P473, P474)由此一评价可以看出,章太炎对治学条理严密、见解精到并有创造性的皖派是相当推崇的,视他们的成就为清代考据学的代表性成就。与吴、皖并行者,尚有浙东之学,擅长《礼》学与史学,如万斯大、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黄式三、黄以周之属。此外,则有桐城派与今文学。章太炎对此二派皆评价不高,称“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以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学始于庄存与,继之者刘逢禄、宋翔凤,刘“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而宋则“最善附会,牵引饰说”,及至魏源、龚自珍、邵懿辰,更是“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讠语。”今文家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此外如廖平“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19](P475, P476)如此看法,充分表露出章太炎的朴学家立场和古文经学背景。在论列上述流派分布与传承系统之后,章氏又对清代学者疏证儒家经典之作予以评述,一一列举其价值所在、高下得失,灼见时出。

《清儒》一文代表了章太炎对清学的总体看法,晚年他又有《汉学论》和一些与清学相关的演讲补充、完善了其看法。在《汉学论》中,他对清代汉学之利弊做了分析,认为“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度制,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而未流适以汉学自弊,

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20](P20)“清儒以汉学植名,薄魏晋经说不道。”“余谓清儒所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实则魏晋经说不可轻视,因“汉人牵于学官今文,魏晋人乃无所牵也。”^[21](P21, P22)可见他对清代汉学整体上评价不低,尤赞赏其中的三礼之学,但同时也尖锐地指称清代汉学之所失,恰“在牵于汉学名义”,鄙薄魏晋经说,有此门户之见,故使成就有限。至于“以汉学自弊”之“末流”,则为今文家及撰《彝器款识》的潘祖荫之类高官。在演说《清代学术之系统》时,他指出:“清代学术,方面甚广,然大概由天才而得者少,由学力而成者多。关于天才方面的,如诗、词、古文等均属之。清代的诗本不甚好,词亦平常,古文亦不能越唐宋八大家之范围,均难独树一帜。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乃清代所特长,亦特多:如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等,均甚有成绩。此等学术,全赖学力,不赖天才。此外如理学,是半赖学力、半赖天才的,清代于此学亦不甚高明。”^[22]该演讲即是对清代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的简略概述,其中以主要篇幅谈经学,对其传承系统与流派分布的叙述,一本于《清儒》,只是在《清儒》所论基础上又增加了扬州之学。该演讲作于1932年,可见章太炎对以经学为核心之清学的基本看法前后没有大的变化。

(二) 专论

与通论相比,章太炎关于清学史的著述更多体现在谈具体问题、具体学者的专论上。在《衡三老》(《说林》上)、《非黄》等篇中,章太炎对清初大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分别有所议论,其间往往出于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予以褒贬,如推崇顾炎武、王夫之,说顾氏“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15](P117)称王氏为“民族主义之师”,王著《黄书》、《噩梦》意在“尊汉族而拒羯夷”。^[16]相反,因黄宗羲很少阐发“历史民族”思想,且对清廷的妥协态度较明显,所以章太炎说他“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23](P124)大加贬斥。在学术上,章氏肯定顾炎武以《音学五书》、《日知录》等著作开启清代汉学的贡献,但对王夫之的哲学理论未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简单地说王氏之书“没有什么学理”。^[24]这些评价,一方面显示出章氏的不凡识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的偏执之短。

在《颜学》、^①《悲先戴》(《说林》上)、《释戴》等

① 《儒墨》、《儒道》、《儒法》等篇 1897 年已在《经世报》、《实学报》上发表,后经修改收入《馥书》。

篇中,章太炎对颜元、戴震均有所评论,赞赏他们反宋儒的精神和反满致用的微旨,说“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桑阴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以混华、戎之界。寿不中身,愤时以陨,岂无故耶?”^[15](P118)同时又对他们的一些主张提出批评,如指出颜元出于反对理学空谈,痛恨其贻祸之目的,对著述讲学予以抨击,转而提倡躬行实践,以习德、行、艺三物为学,这有合理之处,但矫枉过正,实则颜元之病在于“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25](P153)即对学问的理解失之肤浅,缺乏理性思维和抽象概括能力;认为“(戴)震书多姗议老、庄,不得要领,而以浮辞相难,弥以自陷,其失也。(老、庄书本非易理,戴君虽明六艺儒术,宁能解《齐物论》耶?又释氏经论,盖戴君所未睹,徒刺取禅人常语,而加驳难,尤多纰缪。”^[26](P124)在当时举世称赏颜元、戴震的氛围下,章太炎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判断,充分表现出独立思考的学者本色。

在《学隐》、《哀后戴》(《说林》上)、《校文士》(《说林》下)等篇中,章太炎对清代一些学者、文士做了点评,尤集中对晚清今文学者戴望、魏源、龚自珍做了评论。其中对戴望之行事评价甚高,“观其缀述《颜氏学记》,又喜集晚明故事,言中伦,行中虑。柳下、少连之侪也。”但对其治公羊学并使之流传于湖南、广东间,则很不以为然,说此点“致使浮竞之士,延缘绪言,以成《新学伪经》之说。彼以处士而遭刘歆可也,为胡之国师者,可以讥莽之国师乎?”^[15](P118)对魏源、龚自珍,章太炎基本持否定态度,尤其对魏源,说“魏源深诋汉学无用。其所谓汉学者,戴、程、段、王未尝尸其名。而魏源更与常州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大者为汉奸、剧盗,小者以食客容于私门。”^[27](P481)相对而言,由于龚自珍是小学名家段玉裁的外孙,幼承古文家法,后来才转向今文派,故章氏对他还算客气,说“自珍承其外祖之学,又多交经术士,其识源流,通条理,非源之侪。然大抵剽窃成说,无自得者。其以六经为史,本之《文史通义》,而加华辞。观其华,诚不如观其质者。”^[28]

(P121)从这些言辞来看,非学术的因素影响了章氏对魏、龚的评价。由于此二人曾出任清廷官吏,虽多批评时政,却回避满汉民族矛盾,又都治今文经学,所以难入章氏法眼。这既显示出民族主义视角对章氏的制约,又表明古今文学分歧以及与康有为之间的争论等现实因素有损于章氏评价的客观性,此点甚至波及戴望。

在《俞先生传》、《黄先生传》、《孙诒让传》等篇中,章太炎对老师俞樾和师辈的黄以周、孙诒让等人之学做了评述。在总体上,认为俞、黄、孙三人是浙江朴学后劲,对完善朴学厥功至伟,“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蕪之,昌自先生(指俞樾)。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时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彀张,不弛愈缮。”^[3]谈俞樾时,对其著名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做了恰当评价,认为其“治群经不如《述闻》(王引之《经义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王念孙《读书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巡察理,疏纒比昔,牙角财见,絀为科条,五寸之矩,极巧以展,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郭矣!”^[3]对黄以周,则评之曰:“为学不拘牵汉宋门户,《诗》、《书》、《春秋》,皆条贯大义,说《易》综举辞变象占,不偏主郑、王。尤邃三礼。”“先生博文约礼,躬行君子,独泊然如不与世俗成亏者。林颀山颂之曰:‘履贤体圣,怀抱精纯,绍闻衣言,董振汉学。’呜呼至矣!”^[29]对孙诒让,同样有非常高的评价,说“诒让学术,盖笼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诒让治六艺,旁理墨氏,其精博足以摩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对其《札迻》一书评价尤高,甚至认为超过本师俞樾之《诸子平议》,“书少于《诸子平议》,校雠之勤,倍《诸子平议》。”^{①[30]}从这些评语能够看出,章太炎对这三位同为朴学大师的乡先贤十分推崇,尽管这里有情感因素,但可说基本是客观求实的,仅从其明确指出本师俞樾有不及孙诒让处便可证明此点。^②

总之,章太炎以言简意赅的文字和短小精悍的篇幅勾勒出清代学术的基本面貌,尤对以经学为研讨主体的学派与学者多下考语,灼见纷呈。从时间上说,章氏是近代学者中最早系统阐释清学史者,所以他的见解虽有吸纳前人成说之处,但大体是原创

① 《廋书》重订本中为《颜学》,《检论》中改为《正颜》,内容有变动。

② 在《瑞安孙先生仿辞》中,章太炎亦明确指出,孙诒让“名取隐,言故训,审慎过二师(指俞樾、黄以周)。”见《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的。这种首开其端的建树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其对后人之影响亦为世所公认,可谓功德无量。

参考文献:

- [1] 侯外庐. 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M]. 下册. 上海: 生活书店, 1947.
- [2] 章太炎.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光绪二年、光绪十一年[A]. 近代史资料[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3] 章太炎. 俞先生传[A]. 太炎文录初编: 文录卷二[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 [4] 章太炎. 春秋左传读[A]. 章太炎全集[M]. 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5] 章太炎. 自述学术次第[A]. 陈平原编校.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章太炎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6] 汤志钧. 近代经学与政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7] 章太炎. 国故论衡·原经[A]. 陈平原编校.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章太炎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8] 独角. 论经的大意[J]. 教育今语杂志, 第2册, 1910—04—09.
- [9] 汪荣祖. 章氏原经[A]. 章太炎研究[M]. 台湾: 李敖出版社, 1991.
- [10] 张勇. 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J]. 历史研究, 1994(3).
- [11] 章太炎. 清儒[A]. 朱维铮编校. 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重订本.
- [12] 国学保存会简章[J]. 国粹学报, 第13期. 1906—02—13.
- [13] 刘师培. 孙兰传[A]. 刘申叔先生遗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14] 章太炎. 别录乙[A]. 朱维铮编校. 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重订本.
- [15] 章太炎. 说林[A]. 上. 章太炎全集[M]. 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16] 章太炎. 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J]. 民报, 第22号, 1908—07—10.
- [17] 国粹学报发刊辞[J]. 国粹学报, 第1期. 1905—02—23.
- [18] 章太炎. 致吴君遂书[A]. 汤志钧编. 章太炎政论选集[M]. 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9] 章太炎. 检论·清儒[A]. 章太炎全集[M]. 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20] 章太炎. 汉学论[A]. 上. 章太炎全集[M]. 五.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1] 章太炎. 汉学论[A]. 下. 章太炎全集[M]. 五.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2] 章太炎. 清代学术之系统[J]. 师大月刊, 第10期, 1934年3月.
- [23] 章太炎. 非黄[A]. 章太炎全集[M]. 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4] 章太炎.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J]. 民报, 第6号, 1906—07—25.
- [25] 章太炎. 颜学[A]. 朱维铮编校. 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重订本.
- [26] 章太炎. 释戴[A]. 章太炎全集[M]. 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7] 章太炎. 检论·学隐[A]. 章太炎全集[M]. 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28] 章太炎. 说林[A]. 下. 章太炎全集[M]. 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29] 章太炎. 黄先生传[A]. 太炎文录初编: 文录卷二[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 [30] 章太炎. 孙诒让传[A]. 太炎文录初编: 文录卷二[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Zhang Tai—yan Expounding on the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LI Fa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is highlighted in Zhang Tai—yan's vision field of learning history. His com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on some schools of learning and senior masters are generally fair and true which display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modern scholars in the review of the learning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Meanwhile, his study has the strong realistic implication because of the era factor. His works discussed the learning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can roughly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general statement on the overall feature, schools distribution and inheriting system of the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special statement on some concrete problems or some scholars of the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In the modern China, he is the first scholar in explaining systematically the learning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so his opinions are basically original and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Zhang Tai—yan; the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the general statement; the special statement

(责任编辑 魏晓虹)